从传统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理念

—以“亲、诚、惠、容”为中心[①]

邢丽菊

〔提　要〕去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正式提出我国周边外交要突出“亲、诚、惠、容”的基本理念。这四字也蕴含着新政府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的执政理念。“亲”强调的是亲缘纽带关系，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缘、人缘、文缘方面的相通和亲近感；“诚”既有真诚无妄的一面，也包含诚实守信、不欺侮的意味，体现了中国对待周边国家真诚有信之态度；“惠”强调的是互惠互利，中国的发展只有给周边带来实惠和利益，才能实现互惠共赢，同时在这过程中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容”彰显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宽广胸襟和不凡气度，既承认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也追求实现差异中的和谐共存。这四字理念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性思维和交互性伦理，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实现和谐共存、和平发展的梦想。

〔关键词〕中国外交、周边外交、“亲、诚、惠、容”

〔作者简介〕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韩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4）3 期 0000-00

中国是世界上周边环境最复杂的大国，周围有许多陆地接壤、隔海相望或不接壤而临近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多差异。周边与我们的联系之密切、交往之频繁、利益之攸关都说明了它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②]如何处理并发展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成为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试金石之一。

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非常重视周边外交的重要作用。中央不仅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主席还在会上提出了我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首次正式提出的这四字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精髓。

不仅如此，习近平主席还多次在重大场合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去年 8 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突出的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③]

文化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概念，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在于文化，它体现了一国或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关于文化与外交的关系，美国学者洛弗尔（John P. Lovell）认为“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中产生的”。[④]文化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文化通常会体现在这个国家的软实力上，体现其国家战略利益。[⑤]众多研究已经表明，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凝聚力

[①] 本文系“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项目、2012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项目编号 12JZD007）的研究成果。

[②] 王毅：“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7—18 页。

[③] “习近平谈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文明网理论频道，http://www.wenming.cn/ll_pd/wh/201312/t20131211_1631206.shtml。

[④]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 月，第 7 页。

[⑤] 赵洪波：“提升中俄文化外交战略的再思考”，载《东北亚论坛》2013 年第 6 期，第 108 页。

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凸显其深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因此，本文将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对周边外交四字理念“亲、诚、惠、容”做一下理论分析。

一、亲：亲缘纽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亲带有一种浓厚的血缘性情感因素。《说文解字》曰“亲，至也”，清代段玉裁注释为：“父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谓之亲”。可见，亲的最初意思为父母双亲，是对跟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父母的至高之爱，是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道德情感。此外，传统经典中对亲的其他解释主要有：

“亲，爱也，近也。”（《仓颉》）
“亲，谓仁恩。”（《荀子·不苟篇注》）
“亲者，属也。”（《礼记·大传》）
“慈爱之心曰亲。”（《孝经序·注》）
“亲，九族也。”（《左传·昭十四年·杜注》）

可见，亲始于父母之爱，后又衍生到跟自己具有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亲族之爱，体现了一种血缘归属感和认同感，是用亲近和爱的方式表达的一种道德情感。《周易》所言“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也表达了对根源或宗族的这种归属感。儒家非常重视亲，这从五伦[①]的第一条便是“父子有亲”中可以得到确认。孟子反复强调“事亲为大”，认为“事亲，事之本也”。[②]亲，是人身之源，人的身体发肤皆受之于父母，人伦的底线就是敬爱父母，这就是“亲亲”。儒家的思想体系就是建立在这种血缘亲情之上的，儒家的诸多道德纲目如忠、孝、弟、仁、礼等也是以亲情为基础的。

然而，亲并不局限于此，它还体现了一种普遍的德性原则，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③]亲亲之爱是爱的出发点，要在此基础上拓展延伸到家庭以外的人身上，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④]甚至还要能够惠及天地万物，达到一种“仁者，无不爱也”[⑤]的境界。这种境界指向的是一种悲悯的情怀，以此来实现人的社会义务。仁者爱人，爱从人际关系中提取，而最根本的人际关系即为亲。因此，儒者泛爱天下始于爱与自己最亲近的人。可见，亲的德性在于推己及人，此于孔子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孟子为恻隐之心，以爱己之心爱人爱物。如此，儒家的亲已经超越了血亲之爱而具有泛爱万物的性质。后来，宋代的张载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成“民胞物与”，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⑥]就是说，民为同胞，物为同类，一切为上天这一同源所生，因此要泛爱一切人与物。

儒家注重“为政以德”，德的出发点便是亲，仁政与王道实质上也是亲情理念的延伸与升华。孔子曾在比较了法治与德治的效用差异后认为，如果用道德来治理百姓，用亲情礼义来约束他们，则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会纠正自己的过错，这就凸显了仁政和德治在教化民众、治理国家方面的重要价值。《大学》在讲到“絜矩之道”时也指出“所谓平天下在

---

① “五伦”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五种人伦关系，具体而言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② 《孟子·离娄上》。
③ 《孟子·尽心上》。
④ 《孟子·梁惠王上》。
⑤ 《孟子·尽心上》。。
⑥ 《正蒙》。

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为政者的德性可以教化民众，由此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儒家反对通过战争的手段（霸道）成王，反对用战争的方式解决争端，主张用宣传道德教化的方式来“柔远人，怀诸侯”，[①]用怀柔的温情让天下人归顺。富而不骄，强而好礼，是中国人崇尚的德行；强不胁弱，强不犯弱，强而行礼是中国人注重的文明。因为“以力假仁者”是行霸，不会让人心服口服；只有“以德行仁者”才可以为王，才可以使人心悦诚服。[②]儒家的最终理想是达到“内圣外王”，外王也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③]的大家亲情为根本的。

可见，亲于儒家而言，是爱，是友善，是和睦，是相互关照，彼此温暖。用爱自己的方式爱他人，爱自己国家的方式爱其他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周礼》中所讲的“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

具体到周边外交来看，地缘上，中国与 14 个国家陆上相邻，还有多个国家隔海相望。周边已经成为与我国联系最密切、交往最频繁、利益影响最直接的地区。由于地缘相近，因此便于开展经贸往来和区域合作。经济上，2012 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已经达到 1.2 万多亿美元，2013 年中国与东亚和南亚国家贸易额超过 1.14 万亿美元，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半数来自亚洲，对外投资约七成投向亚洲国家和地区。政治上，自去年新政府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先后出访了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中亚邻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接待了数十位周边国家领导人访华。[④]仅去年一年，中国和南亚国家外长以上互访超过 70 起，双多边场合会谈会见 300 多场。体制建设上，目前我们与周边已经建立起 10+1、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亚信会议、六方会谈等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

人缘上，中国和周边国家人种相近，有着天然而成的血缘亲近感。由于血脉亲近，因此易于开展人文交流和友好往来。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在亚洲国家共开设 66 所孔子学院和 32 所孔子课堂，互派留学生近 50 万人。[⑤]如今周边国家不仅是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地，也是中国公民海外旅游的首选目的地。不仅如此，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及蒙古、印度等国的友好交流年，中印缅还将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共同办好这些活动，将会不断增进中国与周边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文缘上，中国与东亚国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与南亚国家共享佛教文化，与中亚国家拥有丝绸之路的历史纽带。在数千年的历史交流中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⑥]玄奘西游、郑和下西洋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佳话，这些无疑都为推进亚洲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多年来，我们一直与周边国家如“走亲戚”般常来常往，这些互动交往本身就说明了我们与周边国家特殊的亲近关系。

所以，亲就是要巩固这种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情感纽带。亲仁善邻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去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讲“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今年 2 月习主席在索契冬奥期间也强调“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⑦]今年 4 月博鳌论坛期间，李克强总理先后会见了来自周边国家老挝、东帝汶、韩国、巴基斯坦等国总理及与会代表，就加强中国同对方国家的合作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传达了中国政府对周边外交以及近邻、友邻足够重视的讯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感情是增进国与国、人与人之

[①] 《礼记》。

[②] 关于“王道”与“霸道”的具体论述可参见《孟子·梁惠王上》。

[③] 《论语·颜渊》。

[④] 王毅：“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8 页。

[⑤] 刘振民：“坚持合作共赢，携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9 页。

[⑥] 同王毅上文，第 18 页。

[⑦] “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新浪网，2014 年 2 月 10 日，http://news.sina.com.cn/c/2014-02-10/075429424819.shtml。

间关系的第一要素。每个国家和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与别人融为一体，希望受到理解和尊重，希望自己被赋予意义，因此要在既有的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沟通和共感，增进和强化亲缘关系。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①]

二、诚：真诚有信

中国传统文化对诚的探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尚书·太甲下》记载曰“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此处诚主要指的是对鬼神的虔诚。《周易》指出“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意即君子说话做事要做到诚实勿欺，如此才能建功立业。这里的诚已经具有了日用伦常的道德意义。[②]

关于“诚”最为经典的论述出现在《中庸》中。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天之道”是自然之道，意即“诚者”之“诚”是不需要人的主观努力即可实现的，是“真实无妄”，是“尽真实”；“人之道”即通过人为而诚，意即“诚之者”之“诚”是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来实现的。在《中庸》看来，“天之道”就是“为物不贰”、“於穆不已”，“不贰”即前后一贯，“不已”即永不间断、永不停息。《中庸》以诚为天之道，也就是认为天（自然）具有一种客观规律性，[③]这种规律性是客观存在的，本来如此而已。因为诚是天地自然的本性，所以人只有将此诚修到极致，才能尽显其性，从而让他人和万物尽显自己的本性，这就是“成己成物”。如此，人才能达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并共参天地化育之境界。

孔子没有直接言诚，但他多次讲到仁，仁的修己爱人之内涵与诚其实是相通的。在孟子看来，“思诚者，人之道也”，[④]此处的诚成为规范人们道德言行的重要概念。到了荀子那里，他不仅认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⑤]而且指出诚为“政事之本”，将其从做人之道扩展为治世之道。唐代李翱也指出“诚者，圣人性之也”，[⑥]这些都阐明了诚在君子修养身心和治国方面的重要意义。宋代周敦颐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思想，认为诚源于万物资始的乾元，是至善的本性，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⑦]后来朱熹又指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⑧]王夫之认为“诚者，约天下之理而无不尽”，“合内外，包五德”，[⑨]将自然之理与当然之理统摄起来。可见，诚是人至善的本性，是一切道德的根源。具体到对人而言，要真诚，要诚实，要诚心诚意，要施善于人。可见，诚不仅具有“本来之规律性”的本体论意义，也具有“修养身心”的方法论意义。

在实践中强调诚的方法论意义，就不能不提到信。孔子十分重视信在治理国家中的积极

---

① “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四字箴言：亲、诚、惠、容”，新华网，2013 年 11 月 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08/c_118063342.htm。

② 邢丽菊：“朴槿惠哲学思想研究”，载《东北亚论坛》2013 年第 6 期，第 96 页。

③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 12 月出版，第 100—101 页。

④ 《孟子·离娄上》。

⑤ 《荀子·不苟》

⑥ 《复性书》。

⑦ 《通书》。

⑧ 《中庸章句》。

⑨ 《读四书大全说》。

作用，认为治国即使“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理由是“民无信不立”。[①]孔子还认为信是国与国之间相交的道义标准，“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②]孟子把“朋友有信”列为五伦之一，也突出了对这一道德规范的重视。春秋时期管仲首次将诚与信连用，指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③]认为诚信是集结人心的保障。在现代汉语中，诚与信常常连用，二字虽各有侧重，但互为贯通，正如张载所言“诚故信，无私故威”。[④]诚信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所，是结交朋友、进德修业之基，是治国安邦之道。崇尚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传统美德。

具体到外交来看，我们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的深厚情谊就是一个典型范例。中国政府长期给予他真诚而热情的帮助，双方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中柬友谊深受两国人民好评。[⑤]他的家人访华，中国政府也经常做出高规格的接待和安排。这种不忘老朋友的诚信品质更让柬埔寨首相洪森和各党派坚定奉行对华友好的政策。习近平主席去年 10 月访问马来西亚时，纳吉布总理在家宴上说，马中建交就是因为觉得中国领导人是可信的。而且他也通过与习主席的会谈感受到，中国是马来西亚可以信赖的国家，习主席是可以信赖的朋友，表示要把中马友好代代相传下去。[⑥]这些国际佳话都是我们用真诚换来的，要继续秉承和发扬光大。

在外交实践中，我们要充分发挥诚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之双重意义，做到如下几点：

一是诚实，即要诚心实意的尊重并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现实，都有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因此，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周边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和意愿强加给他国，也不要干涉他国内政，要以真诚无妄的心态来交往，说真话，办实事，以诚相待。

二是诚信，即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要信守承诺。无论是陆地边界争端还是海上岛屿纷争，既要充分尊重历史事实，也要按照相关国际法的原则和精神，更要信守业已达成的谅解和做出的承诺，以诚信的姿态处理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纷争。中国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基本方向不变，致力于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和平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主张不变。[⑦]

不仅如此，周边外交中的互信也非常重要。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我们要赋予周边区域合作更多的互信之时代内涵，因为一些亚洲国家还存在明显的信任赤字。互信的基础，是尊重历史、以史为鉴，是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恪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以诚相待、互学互助。[⑧]

三是诚意，即真诚的开展协商、对话和合作。面对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周边国家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希望更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由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担忧中国在亚洲的“一家独大”会挤占别国发展空间，走国强必霸的老路。[⑨]因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耐心和诚意，通过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综合手段，同周边国家展开积极合作。

所以，诚就是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中华民族素来是讲诚信的民族，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只有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才能争取到更多朋友和伙伴；[⑩]只有做到

[①] 《论语·颜渊》。
[②] 《论语·学而》。
[③] 《管子·枢言》。
[④] 《正蒙》。
[⑤] 王毅：“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8 页。
[⑥] “美丽的弧线：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光明网，2013 年 10 月 7 日，http://news.gmw.cn/2013-10/07/content_9093727_2.htm。
[⑦] 刘振民：“亚洲的安全与中国的责任”，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28 页。
[⑧] 杨洁篪：“自信互信，共襄盛举”，外交部网站，2014 年 4 月 10 日，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45772.shtml。
[⑨] 刘振民：“坚持合作共赢，携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5 页。
[⑩] “习近平：做好周边外交，争取更多朋友伙伴”，中财网，2013 年 10 月 25 日，

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继续付出真诚的努力和行动，才能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信任和支持。[①]

三、惠：互惠互利

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从字源学的角度看，惠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尚书·皋陶谟》曰“安民则惠”，孔安国传曰“惠，爱也”。《说文解字》曰“惠，仁也”，孔子也指出“惠则足以使人”。[②]在中国古代，惠主要指的是君主施恩于臣民，给予他们一定的好处，如此便可以动员或号召他们。在儒家看来，若实施仁政，就需要做到“惠民、富民、教民”，其中惠民是第一步。朱熹对此注释为“惠，爱利也”。“惠民”就是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③]为政者不仅不能夺民之利，而且要顺民之所利。民得到了实惠，就可以逐步实现富，富民是保有天下的重要保障，因为“四海困穷，天禄永终”。[④]可见，儒家的仁政是通过惠民达到民富，“使民富且寿”，如此百姓便可以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⑤]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惠虽然暗含着一种上对下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需要施受双方共同维护的。儒家要求“君惠臣忠”，只有上下呼应，才可以协力实现太平。墨子主张“兼爱”、“互利”，也提出了“君不惠，臣不忠”。若君做不到惠，则臣可以不忠，不谏言，隐退而不再辅佐朝政。在这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人格和利益的平等。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注重的是惠的效果，其思索的角度或着眼点始终不离社会治理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他们不看重一般的“惠”，他们看到的是“惠本”，即“惠”的根本，他们所谈的“惠”是一种“大惠”。如同《国语》中曹刿对鲁庄公所言“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故不可以不本”。因此，“惠”就是对平等的诉求，就是实现双赢，构建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此，才能实现《诗经》所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理想。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惠呢？《周书》认为“爱民好与曰惠”，《孟子》主张“分人以财谓之惠”，《新书》指出“心省恤人谓之惠”，就是要切实考虑对方的实际利益需求，设身处地体恤对方的情感感受，争取做到“惠而不费”。

由于惠与利直接相关，因此在实施惠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遇到道德判断标准的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利与义的关系。“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关于二者的关系，儒家的总体原则是“义重于利”。可以求利，但要在义的前提下去追求，而求利也是为了更好的践行义。如《左传》所言“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礼法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定人民。如此，整个社会才能够稳定有序的发展下去。

但儒家并不否认个人利益，也承认私欲的合理性。在孔子看来，“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⑥]应该在合乎道义的前提下追求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荀子也认为好利是性情使然，性情是天生的，“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⑦]人天生有求利之欲，这是正常的。但在二者发生矛盾而不可兼顾时，儒家则坚决主张“义重于利”。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⑧]“君子义以为上”，视义为崇高的道德价值。孟子认为要“贵义贱利”，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

---

http://www.cfi.net.cn/p20131025002658.html。

[①] “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四字箴言：亲、诚、惠、容”，新华网，2013 年 11 月 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08/c_118063342.htm。

[②] 《论语·阳货》。

[③] 《论语·尧曰》。

[④] 同上。

[⑤] 张志宏：《德性与权利—先秦儒家人权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 年 9 月，第 130 页。

[⑥] 《论语·泰伯》。

[⑦] 《荀子·正名》。

[⑧] 《论语·述而》

甚至要“舍生取义”来捍卫道德尊严。荀子提出要“以礼节欲”、“以义制利”，[①]好利是人的本性，但义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西汉董仲舒认为人有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双重需要，“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②] 但两者并不具有同等意义，其中道德需要是人的本质需求。宋儒认为“义利云者，公与私之异也”，[③]进一步阐明了义利之辨的实质是公与私的关系，认为义指社会整体利益，为公；私则指个人一己之利，为人私。[④]可以说，义利之辨也代表了处理公私矛盾等问题的道德原则。

可见，儒家的义利观将义融入到利之中，使得求利的过程符合义，赋予利以义的分量。这并不是放弃了利，而是改造了利的内涵。所以从理论上讲，儒家的义利观具有普世意义。

具体到外交来看，10 多年前，我国率先与东盟启动双边自贸区的谈判，并于 2010 年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贸区，这其中在很多条款上照顾了东盟国家的利益关切。今天的东盟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第一大目的地、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以及主要旅游目的地。去年，我国领导人又提出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再次向东盟国家展示了合作共赢的诚意。[⑤]不仅如此，去年一年来我国针对周边各个战略方向，有侧重、有重点的积极开展工作，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等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和构想，提升我国与相关国家的战略合作水平，使我国发展更多的惠及周边国家。[⑥]去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提出了“一带一路”两大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博鳌论坛时也强调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丝绸之路不再是历史上的过去式，而是能给亚欧相关国家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现在式，更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背景下东西合作交流的未来趋势。这些战略举措进一步增进了我国同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为我国发展争取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所以，惠就是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我们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⑦]同时在考虑自己核心利益时，也不能忽略别国的利益诉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更要做到“宽惠而有礼”，[⑧]以仁慈友爱的姿态来对待其他国家，要着眼于大惠而不是眼前利益，要积极利用丰富的资源和庞大的市场给周边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进而实现互惠互利。要从整个世界发展的大义出发，在发展的过程中着眼于长远之义，坚持《大学》所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如此才能收获更大的利益。特别是对那些与我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我们要更多的考虑到对方利益，注意多予少取，早予晚取，绝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⑨]中国只有自身发展了，才可以给周边国家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如此才能实现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可见，惠意味着我们在周边外交中，一要致力于建设利益共同体，不断拓展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合作；二要打造合作共赢的机制，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层次，在相互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三要发扬舍利取义的精神，在处理周边关系时懂得取舍之道。如此，才能建立一个共惠利的命运共同体。

[①] 《荀子·王制》。
[②] 《春秋繁露》。
[③] 《河南程氏粹言》。
[④] 熊万鹏：《人权的哲学基础》，商务印书馆，2013 年 8 月，第 267 页。
[⑤] 王毅：“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9 页。
[⑥] 杨洁篪：“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5 页。
[⑦] 同杨洁篪上文，第 4 页。
[⑧] 《韩诗外传》。
[⑨] 同杨洁篪上文，第 5 页。

四、容：宽广包容

容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盛”，徐铉注曰“盛受也”，《易经》认为“君子以容民蓄众”，《尚书》指出“有容，德乃大”，《管子》记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可见，容具有盛受、接纳、容忍、包容之意。明代兵部尚书袁可立自勉联题为“受益惟谦，有容乃大”，清代林则徐也有一幅自勉联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都体现了一种谦虚谨慎、胸襟宽广的情怀，极其吻合“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道德情操。概括而言，容就是对一切事物的尊重，尊重他们的存在和价值，不封闭，不狭隘，开放心胸，容许差异，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和谐共处。所以，容具有双重性：一是对事物多样性的肯定与接受；二是对事物差异性的宽容与包容。

在中国传统中，与“容”意涵相近的概念是“和”。《说文解字》曰：“和，相应也”，本指各种乐声的相互应和。据《尚书》记载，中国古人已经非常了解音乐的和谐作用，并期望通过音乐的和谐来达到人神和谐的境界，即“以和神人”。虽然那时神的概念还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和的境界已经超越了人间，体现了人们对宇宙世界和谐的向往。《左传》中也有记载说“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和谐”。中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等各种关系的模型。因此，对和的追求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理想。[①]

和之所以如此重要，因为它是生成万物的必要条件。西周史伯曾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②]不同的事物相互调和、融合才能生成繁盛的新事物。如果只是相同的事物重复叠加，则不可能产生新的质变，新事物便无从而来。这与《左传》“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一脉相通。差别性、多样性、异质性的存在是事物生长的前提，有区别的多样性的调和才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基本条件。老子亦讲和，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也说阴阳“两者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以和为生成的根本。荀子也指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而生”，[③]可见阴阳双方调和生成万物是古代宇宙论的普遍思维。中国哲学这种崇尚多样性的思维，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只有勇于承认、接受并包容不同事物的差异性，求同存异，才能实现和谐有序的发展，达到“和而不同”。这需要很高的道德修养，需要有宽广的胸襟和气度。但包容并不意味着无限度的一味容忍，要恰到好处的掌握尺度，用“允执厥中”、“执两用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儒家传统智慧来处理好各种关系。

追求外部世界的和谐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尚书》提出了“协和万邦”，可以说是中华文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周礼》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易》的“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也很好的描绘了这种和平共处的世界。万物达到“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④]的和谐状态后，就会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⑤]的境界。这不仅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也会促进整个世界秩序的和谐发展。

具体到周边外交，这种容的胸怀也同样重要。作为东亚大国，中国一向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欢迎域外国家参与到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中来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 10+1、10+3、东亚峰会等各项机制相互补充和促进。中国积极回应各国对亚太地区安全

---

① 陈来：“中华文明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载《中华文化论坛》2013 年第 3 期，第 14 页。
② 《国语·郑语》。
③ 《荀子·天论》。
④ 《中庸》。
⑤ 同上。

的关切，推进地区防务安全领域的交流，充分体现了容人之气度，存异之雅量。[①]不仅如此，我国所处的亚洲地区多样性突出，发展道路多元化，在国际交往中，我们一贯的做法是尊重每个国家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相信地区多样性可以转化为互补互促的发展活力和动力。特别是亚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多种文化共存于全球化世界之中。我们向来坚持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鼓励不同国家文化交流互鉴，和谐共存。[②]

所以，容就是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中华民族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历来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蓄。今后我们在践行容的过程中，一要倡导包容。尽管周边各国与我们有相似的文化或价值观，但因为地域不同及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可避免与我们有相异或冲突之处。因此要求同存异，承认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允许多元文化共同发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更加积极主动的回应周边国家的期待，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③]二要学会宽容。因为中国地广人多，发展迅速，实力强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与其他国家不同，因此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持有怀疑、担心等，这是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宽容这些质疑的声音，用切实的行动来打消他们的疑虑，进而实现和谐共处、和平发展。

五、结论：以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引领周边外交政策与实践

中国外交发端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落脚点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亲、诚、惠、容”这些独具东方特色的文化价值观，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④]亲注重情感渊源，是基础；诚突出诚实守信，是态度；惠强调惠利道义，是目的；容彰显胸怀气度，是境界。这四字理念虽然各自侧重点不同，但在“仁”这一点上是可以实现统一的。

仁者爱人，爱始于亲，亲亲才能仁民，仁民方能爱物；仁者坚持至诚原则，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本性，由此才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才能参与天地化育万物，实现天人合一、至诚至善的境界；仁者时刻体恤他人的情感感受，这就要顾及他人的实际利益并惠及他人，才能获得理解和信任，才能实现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仁者以爱人之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需要有宽容、包容的胸襟来认同差别性和多样性，从而实现和而不同。

众所周知，仁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说文解字》曰“仁，亲也，从人从二”。仁的基本内涵是“仁者爱人”。不仅如此，“爱人者，人恒爱之”。[⑤] 仁体现了自我对他者的态度，是对他者关怀爱护的道德情感，是一种有机关联的责任和义务，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连贯性。仁深刻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关联性思维和交互性伦理：世间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联中显现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整个宇宙都应该建立起和谐共处、和平发展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仁也是中国外交文化的核心。

正是在仁的基础上，中国外交提出了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都处在一个共同的命运共同体内。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对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传承和创新，

[①] 王毅：“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9 页。

[②] 刘振民：“坚持合作共赢，携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2 页。

[③]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外交部网站，2013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93113.shtml。

[④]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3 页。

[⑤] 《孟子·离娄下》。

体现了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髓和方向。“亲、诚、惠、容”应该成为这一共同体和谐相处的理念和行为准则。这就要求我们在继承中国周边外交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用四字理念来引领外交政策和具体行动，通过弘扬文化外交来向世界奉献中国智慧，从而为人类社会应对新挑战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完稿日期：2014 年 4 月 10 日）

To Interpret China’s Foreign Policy with Neighbouring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ditions: Centred on “Amity, Candour, Reciprocity, and Tolerance”

Xing Liju

Abstract: Last October,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Work of Diplomacy with Neighbouring Countries,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mally proposed the ideas of “amity, candour, reciprocity, and tolerance” as the core principles for foreign policy concerning neighbouring countries - principles that contain the resolve of the new administration to make consistent efforts on advocating the soft power of China’s cultural traditions. Amity (qin) stresses the bonds of amiabilities in geography, populace and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 Candour (cheng) means both sincerity and a credibility based on no-bully policies, embodying China’s consistent honesty and reliability with neighbouring countries. Reciprocity (hui) emphasises mutual benefit, only through which will it be possible to achieve a win-win for both China and it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with an attention to a proper concep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 (yiliguan) in this process. Finally, tolerance (rong) demonstrates China’s inclusive embrace to recognis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well as to achieve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id differences. These four principles reflect an emphasis upon relatedness and intersubjective ethics in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showing in a nutshell China’s long-term national pursui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